

# 新时代英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张坤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表征,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这些重要指示对于同为超大城市的武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 英雄城市立潮头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武汉一以贯之的精神气概。英雄城市虽淬炼生成于伟大抗疫斗争中,其命脉却深植于武汉这座历史名城的千年历史里。在无数次重大历史关口,武汉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总是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立于潮头,为国家发展谱写出光辉的武汉篇章。

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的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城市之根”,见证着中华民族长江中游早期青铜文明;卷起革命风暴的首义枪声从武汉发出;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与万众一心的全民抗战时期,武汉两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广阔天地百废待兴,武汉奋发图强、攻坚克难,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工业城市、华中地区最大交通枢纽和重要教育科研基地。1954年,武汉战胜百年以来有水文记录的特大洪水,确保了当时长江中下游无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汉口江滩防洪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成为改革开放潮头地之一,有许多举措创造了全国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全面落实各项方针政策,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武汉贡献。

## 英雄城市人民建

英雄城市之所以英雄,是因为有无数英雄为之无私奉献。英雄城市人民建,这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武汉从来不缺乏英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涌现出大批舍生忘死的英雄儿女,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孜孜以求,奋力开拓,留下他们光辉的足迹;向警予、夏明翰等诸烈士在这里冲锋陷阵,不惧危亡,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生命。

新时代,武汉人民继承和发扬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英雄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前赴后继、披荆斩棘、英勇奋斗,城市英雄辈出。这一批批不断涌现的英雄人物,为新时代英雄城市建设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模范带动着千千万万武汉人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无数个凡人英雄。英雄城市里永远昂扬着英雄人民的号子,一声更比一声高,声声有力,声声向上,筑牢了武汉英雄城市的鲜红底色。

## 英雄城市为人民

英雄人民之所以英雄,是因为英雄城市全心为人民。英雄城市为人民既是英雄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英雄城市精神传承的基本路径。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要充分认清超大城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的方位,充分把握超大城市的自身特征,深入贯彻“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精准把握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实现英雄城市为人民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需要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机体进行积极活动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作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满足人民群众“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等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才能发动起英雄人民的磅礴英雄气概,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

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实现英雄城市为人民的实践要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指的不仅是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就必须尊重群众、倾听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才能将群众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建设新时代英雄城市。

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本领,这是实现英雄城市为人民的核心要素。党员干部是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死相依的纽带,是党的方针路线的制定者、参与者与执行者,其本领强不强决定了能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增强干部服务群众本领。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到党的二十大突出强调提升服务群众本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本领就要以满足群众需要贯穿始终的主线,立足于新时代新要求,从群众认知、群众情感、服务群众意志、服务群众制度与服务群众能力等五个方面协同把握,使党员干部为群众服好务,实现好群众利益,才能引领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英雄城市。

要始终坚持勇于自我革命,这是实现英雄城市为人民的根本保障。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赢得民心、代表民意、凝聚民力的根本保障。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当前武汉经济社会各方面持续向好,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挑战,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坚持不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关键在“自我”,难点也在“自我”,自我革命必然要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推动党员践行自我革命,必须以巩固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进一步提高党员思想教育的有效性;以形成崇尚奉献友爱的社会氛围为重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激发自我革命动力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党员管理与监督的科学化水平。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不畏风险的胆魄,才能带领群众齐心协力建设新时代英雄城市。

(作者分别为武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武汉市委党校副校长)

影响比较深,在话语上更为突出。比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问题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民主观。要讲清楚什么是中国人民民主,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一个好办法是让地方社区工作者讲述他们的民主故事,让亲历者讲亲历的故事,才能够把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讲清楚。今年4月份我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向国际社会讲全过程人民民主,讲述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六位社区工作者。一个四川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讲完后,比利时首相表示他明白了中国人民民主是怎么回事。所以叙事要有事实,要由亲历者来叙事。

三是叙事要善于用好比较法。鲜明的对比可以产生强烈的思想冲击力。让叙事用鲜活的事实告诉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是14亿多人民,而不是几亿或几千万人民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而不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竭泽而渔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对外掠夺的现代化。人们就不可以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对世界的意义。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 大家小文

和西方化的迷思感到困惑。我们可以用历史告诉他们,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现代化探索,学西方是主要特点,但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了。在反思和寻找新路径过程中,中国终于认识到西方化不是中国好的出路。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现代化”这一新概念来取代广泛使用的“西化”或者“欧化”这些老概念。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用这概念更多的是“西化”“欧化”,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出现了“现代化”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许多先辈到国外考察发现西化、欧化不适合中国,所以用“Modernization”来取代“Westernization”。举例来说,1935年4月天津报刊上发表了张奚若先生的文章,文章题目是《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章先阐明了全盘西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又指出中国本位实际是恢复中国独裁专制,两者都不行,就要推进现代化。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不等于“西化”。1933年上海《申报月刊》开展了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普遍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取代“西化”“欧化”。同时,参加大讨论的26位作者,只有一位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做资本主义现代化,绝大部分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或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是在叙事中讲好生动的中国故事。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受西方中心主义的

# 解决“挨骂”问题,要擅长“中国叙事”

□李君如

“共产党”这一范畴,在许多情况下讲的并非一回事。再比如在与美国对话中,我们使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范畴,虽然谈的是同一件事,但由于大家脑中的概念不同,要达成共识很难。我们讲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国家讲民主就是实行多党制,虽然都叫民主,但对民主的认知不一样。因此,在人际交往当中要讲清楚理论、道理,要用相应的能够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和话语体系。我们要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建设这篇大文章,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

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候,还要考虑如何提高叙事本领,使之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推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要改变国际社会失语、挨骂的问题。考察西方舆论战的做法,他们往往把自己先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或先设计一个价值判断,并通过一系列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至于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案例,即具有放大效应的叙事来抹黑、妖魔化中国。我们自己,很多人写论文写得漂亮,但在交流中往往处于下风地位,不会叙事。因此要改变失语、挨骂,不仅要会有话语,还要会叙事,提高我们的叙事本领。

一是在叙事的时候用丰富的历史资源。历史事物的实践存在方式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因此更具有说服力。比如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为什么要打破现代化

# 马克思如何看待“躺平”

□肖雨 冯雪利

“躺平”一词近年来颇为流行,有的人不工作不上班,每天只吃两顿饭,每月花销控制在低标准内。有的人呢,在工作在上班,但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应当说,有些词语的热度,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症候或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揭示了“996、躺平”这些社会现象的内涵逻辑,以马克思的视角审视这一社会问题,或许能在时代的潮流中多一分冷静。

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手段,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简而言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逃避劳动?

其实,准确说,这些人逃避的是“异化的劳动”,而不是劳动本身。马克思认为,大规模的流水线千篇一律,让劳动变成了机械地重复,以异化的无止境地“上班”取代了自然的劳动。人不再是一个自由、完整的人,只是一个零件,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原本主动的、愉快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了“束缚下从事的活动”。劳动过程不

被人们自己所支配,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感觉幸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处在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问题,但是同时也提出,一个社会形态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释放完毕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因而,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时还会消亡,那么,处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该何去何从?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躺平”是富足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症候。在生产方式低下的时候,尤其是农业社会,唯有每个人辛勤劳作,才能获得生存和养家糊口的生活资料,劳作与满足生存之需具有直接性的关联。进入现代化大生产,尤其是信息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之后,分工越来越细,工业发展的链条越来越长,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与生存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弱,立即获得劳动强化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变得遥不可及,劳动的激情减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躺平”具有正义性。应该说,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不仅仅像一般动物那样适应客观世界,而是有意

识、有目的、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改造客观世界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如果自然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人就要想办法通过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如果社会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创造条件,才是真正的人的主体性力量的体现。

青年拥有宝贵的情感和无限的创造力,而劳动是将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关键一步。在工作中寻求尽可能多地获得感和幸福感,工作中和劳动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和支配性越高,就越自在、越幸福。

必须看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异化”,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本质不同,具有显著优势。比如说,我们坚持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既为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提供了有效方案,也为解决各类消极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走协调共进、发展共享的发展道路,不仅能够缩减和均衡地区、城乡、产业、社会层次等方

# 用好“农耕文化”这个振兴乡村“助推器”

□方菲 张新宇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农耕文化积淀了数千年农耕社会的智慧经验,滋养着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它蕴含着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多重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以农耕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可着重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托农耕文化资源,托举乡村产业振兴。广袤乡村蕴含着丰富的农耕资源,譬如自然风光、农耕古迹、饮食文化、特色民俗等资源,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一方面,结合农耕文化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开展地方产业项目,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区。另一方面,优化乡村产业空间布局,以点带面,扩大产业辐射范围,促进乡村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二是汲取农耕生态智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农耕文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内含天人合一、万物同源、不违天时、御欲尚俭等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了生态理念支撑。乡村振兴应重拾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探寻生态振兴新路径。一方面,建设美丽生态空间,展现乡村农耕之美。乡村生

态治理要注重协调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关系,积极保护农耕文化和自然资源,守好乡土文脉。另一方面,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生活品质。结合村民日常生活需求建设相关生活建筑与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生活空间。

三是赓续农耕文化根脉,积极推进乡风文明。乡风包括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礼仪礼节等内容。农耕文化是乡风塑造的重要抓手,乡风文明建设应从乡中汲取营养。一方面,提振农耕文化新风正气,推进乡村移风易俗。注重从农耕文化中吸收精髓,创造性转化农耕文化资源,建立适应新时代生活逻辑的礼俗秩序。如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道德超市银行”等,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崇德重义、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等价值观念,涵养社会良好风尚,培育乡村文明环境。另一方面,加强民俗节日传承,接续乡村优秀文化传统。民俗节庆具有动员民众、记忆历史、娱乐性情等积极价值。它可以通过符号化的社会表达与自身附带的特定习俗,加强村民的文化心理认同,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四是彰显农耕文化“德治”功能,增强乡村治理效能。农耕文化蕴含着家庭、乡邻和国家的道德规范,为乡村治理提供丰富的德治资源。一方面,重视家庭秩序建设,夯实乡村治理根基。家庭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家庭秩序是乡村社会秩序根基。农耕文化所蕴含的“耕读传家”“孝老爱亲”“兄弟弟恭”等思想观念,为家庭建设提供重要思想滋养,为家庭秩序提供伦理资源。乡村可用征集乡村家风故事、评选“最美家庭”等方式,拓展乡村治理实践空间,优化乡村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倡导互助互惠,构建良好邻里关系。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以和为贵”“守望相助”等精神,是维系密切人际交往的精神养分。村庄可以借助农耕文化发展线上线下公共文化互动空间,通过组织“邻里聚会”、推行睦邻养老、引导村民在农忙时节与红白喜事上互帮互助等举措,培育邻里共同体意识,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场域,助力乡村治理有序发展。

五是挖掘农耕文化附加价值,助力乡村生活富裕。生活富裕就是让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

讲文明 树新风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